



那一年,少年12岁,他应该上初一,但是他在三年级的时候留了一级。留级,是因为转学,从家乡转来这里,两边课程不一样,他留级一年。

没有人注意到这次留级对他的影响。在家乡,这个少年是被家里人、被学校老师宠爱着成长的。他很好看,白净,方脸浓眉,高挺的鼻梁,乌黑的头发遗传性地卷曲着。他是家里的老小,和调皮捣蛋到处闯祸、母亲需要随时拎着一篮子鸡蛋上门道歉的哥哥,以及沉默寡言到近乎乖僻的姐姐相比,这个安静、乖巧、漂亮的少年得到了家乡人的一致宠爱。

直到有一天,他9岁,母亲下岗,带着他去另外一个城市投奔父亲,在那里谋生活。带着他是因为他最小,他很乖,也是因为相比上初中的哥哥姐姐,显然他转学更为容易操作。

这样度过了三年。母亲做的是较为长期的零工,比如在工地做饭。这个工地结束了,再换一个工地。他们住在厂区内,靠着一栋瓦顶砖墙的车间,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是草顶。厂里隔成十二三平米的样子安排给单身汉住,这些单身汉的老婆孩子都在家乡。一年中总有些日子,不是家属来探亲,就是单身汉歇探亲假。房子很简陋,夏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,摆上桶、盆接水,都是寻常。甚至燥热的时候,会有骚板虫在室内爬来爬去,也是寻常。但是父亲当过兵,很干净,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,常年燃着蚊香或者檀香。

流沙河先生于几天前去世了。学生时代,我们都在笔记本上抄过他的名作《理想》:“理想是石,敲出星星之火;/理想是火,点燃熄灭的灯;/理想是灯,照亮夜行的路;/理想是路,引你走向黎明……”当年,少年时的我们,在早晨或午夜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诵着这振奋人心的诗篇,这些火热的诗行点燃了我们澎湃的激情和沸腾的热血,让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,恨不得像古龙笔下的侠客或挑战风车的堂吉·柯德,从庸常的生活里突然不辞而别,远走天涯,浪迹江湖,去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
我的少年时代应从考上中等师范的1987年算起,那一年我十七周岁。此前几年,是忙碌的学习生涯,机械而枯燥,没有多少说头。进入师范,和题海与学习资料彻底告别,我突然有了一种恐慌感。师范学校里的课程是相当轻松的,糊弄一下就能及格过关,反正毕业之后都分配工作,成绩好坏无甚紧要。我无所适从,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。

不知怎么就喜欢了诗歌。一个少年,喜欢上了诗歌而不是散文或小说完全可以理解。那是一个崇拜诗人的年代。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,因为我们胸中都有着浪漫的诗情和纯洁的向往。那还算是一个诗歌的年代,朦胧诗潮的余绪还未散



你的样子

唐玉霞

因为是单身宿舍,并没有做饭的地方。母亲和他来了以后,父亲在屋子外面接了个披厦,放了炉子、碗橱,算是简单的厨房。父亲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,在门口种了菊花、美人蕉、茉莉、栀子花,一年四季都有花开。父亲很会做菜。这些在三个兄弟姐妹中,只有他全盘继承下来。

生活就这样安静地过了下来。直到那天,十月底的早晨,母亲去工地烧早饭,他还没有起床。母亲四点多出门,结束后顺带买菜回家,要到九点,接着很快要去做午饭。他的早饭通常是和父亲一起吃。那天早上六点多他起来,也许还没有起来。反正父亲起来了。父亲坐在床上,也许是穿鞋,或者其他,总之,一头栽在地上。少年一跃而起,喊爸爸爸爸。少年冲出去,喊隔壁的人。天已经大亮了,大家七手八脚把父亲抬到床上,后来又推来板车,铺上被褥,把父亲送到医院。

44岁的父亲就这样永远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真正的艰难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的。哥哥姐姐陆续来到身边,和母亲一起,一家四口人,加上挂在墙上父亲微笑的黑白照片。17岁的哥哥隐瞒年龄顶职在父亲的工厂开始学徒。他和姐姐一起上学。他初中结束,和高中结束的姐姐一起参加招工考试。考试在市里进行,需要渡江。因为怕早晨起雾等特殊情况不能渡

江,耽误考试,因为并没有多余的钱住旅馆,他和姐姐一起投奔市里的亲戚,住一夜参加第二天考试。多年后,他们说起那个早晨亲戚家的早餐,烫饭里有薄薄的年糕片,桌上有一小碟红色的豆腐乳,还有一大碟油炸小狮子头,但是他们都没有伸筷子。考试是一天,亲戚说中午来吃饭。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学校花台子的水泥墩上吃烧饼,一块钱四个烧饼,只是没有水喝。

最终,他参加了技校招生。志愿早就填过了,迟迟没有收到通知。直到八月末的一天下午,到市里出差的姐姐气喘吁吁地跑回家,她在公交车上听他的同班同学、一个填写了同一志愿的女孩子说他已经录取,招生老师在市里住了一周,明天就要走。招生老师说联系不上他。

那个下午,他的母亲、哥哥和他一起直奔市里,他还穿着拖鞋,没有来得及换,他们要立刻找到招生老师,如果错过了这次招生,他就得和哥哥姐姐一起在父亲工作的厂里,他们都知道这个厂已经过一天算一天了。两位招生老师,年轻的只是静静地坐着,年老的拒绝接受,说他的体检报告心跳速度慢了,不适合这个行业。那两天有着太多的刁难,最后,最后,他的学上成了。

那个燥热的下午,他穿着拖鞋跟在母亲和哥哥身后,我看不见这个

16岁少年的懵懂无助。我知道我们多么绝望,一次又一次的绝望,却必须从绝望中站起来。多年之后,弟弟,我们,都有了自己的家庭。那天,我在家里说起,你的散淡,年轻时候没有狼性,种花做菜,随遇而安。我的女儿,这个17岁的孩子说,妈妈,你有没有想过,小舅目睹了外公的去世,他是唯一的亲历亲见者。这给他心理造成了什么影响?

这是我们三十多年来从不触碰、但是永远不会愈合的地方。现在我看着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,可以清晰看到父亲的轮廓。但是我总是在他的笑容里,想到一个白净的少年,穿着白色衬衫,米色裤子,在家乡青石路上走过,你的样子多么美好。岁月啊,都过去了,那些经历,有的,很多很多,也都过去了,但是无法忘记的,还是无法忘记,无法割舍的,还是无法割舍。



唐玉霞,在媒体工作。出版有《城人之美》《悠然岁时迁》《千古红颜:她们谋生更谋爱》《回味:美食思故乡》《回味:低头思故乡》《陌上芙蓉开正好》等随笔集。现居芜湖。

文学梦或虚度时光

谢思球

去。学校位于古镇汤沟,镇上的邮政报刊门市部能买到各大文学期刊,诗歌报刊像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《诗神》《当代诗歌》《诗林》等,都是抢手货。特别是本省的《诗歌报》,每期能销几十份。几家小书店里偶尔能买到托尔斯泰、莫泊桑和沈从文、刘恒、从维熙等中外作家的小说,间或也能买到诗集,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年度诗歌报刊选萃,我坚持买了多年,直到这本书不再出版。我们就读的学校里是没有图书馆的,看书只有借阅老师的私人藏书。我的语文老师周雪松先生刚大学毕业,我常到他那儿去借书,后来偶尔也干过借而不还的勾当。这大约就是我们当时的阅读和写作环境。

学校里的学习气氛不浓,这正合我意,没事的时候就来本书到校外的茅草丛里去,很多时候是发呆而不是读书。诗也一首接一首地写,大多是些无病呻吟故作深沉的文字,没有谁把我写诗当作一回事,一个人也没有,除了我自己。买来方格稿纸,把自己的诗一笔一划地誊上去,然后投往各大诗歌报刊。那时还是能收到退稿信的。一段时间下来,就收集了不少诗歌报刊的退稿信封。在我的眼里,它们也是弥足珍贵的,这至少

能说明,我的诗作,在心中的圣地即那些报刊社里转了一趟,我的人生好像也因此有了些许与众不同的意义。

特别欣赏少年,欣赏少年的豪气与雄心。少年相信明天。少年是敬佩保尔·柯察金的年龄,少年相信强者,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,任何梦想都有可能成为现实。我那时差不多在每本书的扉面上都写下了狄更斯的名言——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。少年做事雷厉风行,总是干劲十足,虽然不免毛手毛脚。少年时的我敢藐视一切,成年后还敢吗?那时,我曾写下过这样一首短诗《铁马冰河》:“我渴望风云从案头升起/用青春和热血/和对手作最后一击//剑的冷光步步逼近/让我挥戈上马/让我到冰河上去领取一副人杰的筋骨”。这就是少年时代的我写下的诗行,直白,生硬,充满杀气,字里行间长风浩荡,后来的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诗句。

当时,听朋友多次说过这样一个故事。就在我就读的那所师范学校内,我有一个老乡叫谢宁,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这里任教。在校内,他与同校一位同事的女儿相爱了,女孩的年龄比他小得多。可以想象,他们的爱情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的。有一天,

我的这位老乡突然带着女友远去青海。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辞职还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。我想他在出走前一定经过相当激烈的心里冲突,他对自己当时的生活也一定产生了深深的厌倦。自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,我就从内心里对这位从未谋过面的老乡产生了深深的敬意。遗憾的是,那时并没有哪个女孩看上我,更不用说陪我去流浪地球了。

五十而知天命,知道得太多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好事。希望那个有梦想的少年仍驻在我这具日渐苍老的皮囊里。



谢思球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,著有长篇小说《大泽乡》《大明御史左光斗》等。现居枞阳。